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人 文 中 國 學 術 叢 書

跨學科視野下的 詩經研究

陳 致 主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跨學科視野下的 詩經研究

王立群 著

詩經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

跨學科視野下的 詩經研究



陳致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 I P）數據

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 / 陳致主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

ISBN 978-7-5325-5517-8

I. ①跨… II. ①陳… III. ①詩經—文學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①I207. 22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020517號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

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

陳 致 主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巔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89×1194 1/32 印張 10.625 插頁 2 字數 278,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800

ISBN 978-7-5325-5517-8

I·2174 定價：32.00元

如發生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57603336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

總序

一九九四年間，本校中文、宗哲和歷史三系同人籌辦一份發表人文學科論文，同時有獨立評審稿件制度的學報，取名《人文中國學報》；第一期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出版。《學報》原則上半年一期，出版至今已至第六期了。就個人所知，學術界對刊載論文的水平普遍表示贊許。去年我們把首四期送請幾位海內外知名學者作整體評審，獲得很大程度的肯定，就是證明。

強調科學研究是當今大學常見的辦學方針，本校則科學和人文兩者並重。看到《學報》取得可喜的成績，我們深感欣慰。現在負責《學報》的同人計劃再進一步——除了《學報》，還編纂高水平的學術專著，總名為《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日後相繼出版。這對推動香港乃至更廣遠地區的人文學科研究，無疑會起正面而積極的作用，我們樂見其成，而學校也會提供各方面的幫助。

我在《人文中國學報》首版序中說過，希望《學報》“繁花錦簇，碩果纍纍”。時隔三年，《學報》成績有目共睹，使人振奮。際此《叢書》面世，我還是以說過的八個字祝賀，並且深信在諸位同人努力下，不出三年，成績同樣使人振奮。

是為序。

香港浸會大學校長

謝志偉

序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陳 致

《詩經》一直是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文學專業的學者努力探討其美學價值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對抒情傳統的影響。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將其作為一項主要史料來重新構建古史。古典學者和古文字學家主要致力於《詩經》文本的研究、語源的研究，而歷史語言學家則關注音韻、修辭和句法等方面。過去二十年來與先秦相關各領域的新的考古資料和學術發現，給《詩經》帶來了新的亮點，因此使綜合此前各種方法開展跨學科研究成為必要，並且產生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成績。有鑒於此，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與香港浸會大學傳統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由我主持，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辦了“傑出學人講席：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Distinguished Scholars: Cross Boundary Examinations of the Book of Songs）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到世界各地在《詩經》學方面有突出成績，並且在方法學上具有跨學科視野的知名學者，來浸會大學參加了兩天的學術研討會。應邀從香港以外來參加會議的學者有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的稻畑耕一郎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的柯馬丁教授（Martin Kern），德國海德堡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梅道芬教授（Ulrike Middendorf），大陸山西大學文學院的劉毓慶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虞萬里教授，臺灣玄奘大學文學院的季旭昇教授，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蔣秋華教授。來港的幾位學者和我都就自

已近年來精研的相關議題發表了文章。這次會議又很榮幸地邀請到香港教育學院的陳國球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的呂宗力教授，香港嶺南大學的李雄溪教授、許子濱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健教授，香港城市大學的王小林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的盧鳴東教授以及時在浸會訪問的、上海大學歷史系的朱淵清教授前來參加會議，發表評論。會議期間，與會學者共發表了八篇見解精到的學術論文，以及八篇評議。學者們更是暢所欲言，以求交流學術觀點，對《詩經》進行最前沿的跨學科視野下的思考。

在發表論文的學者中，稻畑耕一郎教授是日本漢學界中專研商周古史、祭祖禮、《詩經》與《楚辭》的著名學者。稻畑教授的文章，題為《周原撫膺——周公廟發掘與詩篇原始》。該文以其敏銳的視角，依據最新的考古發現，考察了先周時期的周公廟遺址。在2004年和2008年，這裏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這項發現儘管獲得了媒體的廣泛報道，但對出土資料的分析、整理才剛剛步入研究階段。稻畑教授的文章介紹了周公廟遺址的發掘成果，並思考這項研究對於詩篇的理解，特別是對周人的史詩的理解，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劉毓慶教授是在《詩經》文獻學及《詩經》學史方面最有貢獻的學者。劉教授的《〈詩經〉之水與中國文學中水意象的歷史考察》一文考察了《詩經》中的水意象，並且認為此意象所反映的是男女之愛，以及由性愛而帶來的人類最深沉熱烈的痛苦，因而水——這一給先民帶來極大的歡樂與痛苦的自然物，便隨着歷史超越了“男女之情”的樊囿，以理想中梗、愁思無限、生命激情等多種象徵意義，出現於文學作品之中。文中作者借用了一個文化人類學中“上古性隔離”理論，提出了《詩經》中水的意象，反映了上古女性水隔離的習俗，使水濱澤畔成為上古男女相思、相戀、相怨之地。

季旭昇教授的《〈詩經〉研究也應該走出疑古時代——以〈召南·甘棠〉詩的詮釋為例》一文援引金文、簡帛文獻為佐證，並以《召南·甘棠》中文字訓詁為依據，證明《召南·甘棠》一詩的確是歌頌召康公奭甘棠遺愛的作品，而并非如宋代學者及清代牟庭等學者所疑為歌頌召穆公虎的詩篇。文章以此篇為例，來證明前人特別是宋人及今人往往疑古過當，並指出《詩經》研究也當走出疑古時代。作者為文字學、金文與《詩經》研究的大家，此文出入傳統文獻與出土文獻，運用訓詁學及文字學、古史學等領域的知識、技能，再次展示了作者的不凡功力。

梅道芬教授的文章《〈詩經〉之微指——以心理語言學理論分析〈木瓜〉〈東門之墀〉》嘗試運用心理語言學的一些關鍵概念來分析《詩經》中的兩首詩歌：《木瓜》及《東門之墀》。作者通過心理語言學的方法，特別是通過雙關語而集中在含混性的問題上，試圖了解詩歌深層結構中的線索。指出這兩首詩都通過雙關語的運用，傳達了精神景觀的深處（the depth of the mental landscape）的意涵。梅道芬教授的《詩經》研究總是以獨特的視角，考察鮮為人留意的意象、語言和內涵，這篇文章可以說是她的一篇代表作。

柯馬丁教授的文章《毛詩之後：中古早期〈詩經〉接受史》考察了漢代《毛詩》奉為正統之後，中古時期，特別是六朝時代文人學者對詩篇的理解并非囿於《毛詩》的傳統，反而呈現紛繁多樣的色彩。作者以實例證明五四以後從文學意義和情愛表達的角度來解讀詩篇的做法，實際六朝時期已露其端倪。作者在美國漢學界中可以說是近年來對《詩經》研究用力最勤，成果最多的一位學者，本文也是作者在這一領域研精覃思的一篇力作。

虞萬里教授之博學審思為學界所公認。這裏收入了虞教授《詩經》研究的一篇力作《從熹平殘石和竹簡〈緇衣〉看清人四家詩研究》。

本文詳細地考察了熹平殘石所見魯詩與清代陳喬樞、王先謙等推斷之魯詩文字之異同，並考訂了竹簡《緇衣》所引詩與陳、王所舉齊詩文字之異同，由此反思清人對於漢代四家詩之歸屬問題之得失，指出清人在研究四家詩過程中將文獻中所引《詩經》異文分隸四家，僅 35% 相合，另 65% 則未必相合。作者並且認為《詩》文本自先秦至隋唐之間至少遭受過先秦、兩漢、六朝三次衝擊與攪亂：即先秦亂於各國構形略異之文字形體，兩漢亂於篆隸和戰國古文之互相對應，六朝亂於崇古與趨時心理支配下手寫與碑刻之別體。文章在在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與邃密之思維。

蔣秋華教授是近年來臺灣地區《詩經》研究的重要學者，《劉沅〈詩經恆解〉的聖人論述》一文以清代四川學者劉沅為個案加以考察，認為其《詩經恆解》的注解方式，乃以義理闡發為主。作者認為劉沅在宗尚聖人理念之下，一切解說都以孔、孟聖人為憑據。對於詩篇中出現的聖賢人物，也全力護衛其美善形象，於其有爭議之作爲，試圖別作新解，其宗經衛道之心，充分呈顯宋學派的治經理想。這一研究為我們展示了清代中晚期漢學考據之風盛行時，四川學者劉沅標舉宋學的特異之處。

我的文章題為《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文章考察了《詩經·周頌》諸篇與金文中共同使用的成語，並運用西周金文的資料，以大量的例證首次提出從西周金文來看，西周中期，也就是共王時期以後金文呈現了入韻和四言化的傾向，並且認為這與西周中期音樂中雙音鐘和四聲音階的使用存在某種聯繫。本文發表數月之後，筆者發現，有學者在新近出版的一篇英文文章中完全採用了我的觀點，並且也用了我的文章所提到的宣王時期豐白車父簋和井（邢）人佡鐘銘文用韻的例證，看來該教授是完全同意我的觀點，我深感榮幸。只是遍查不見其說明觀點

和例證的出處，而且會前會後，亦向未聞其同意我的說法，真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深感遺憾。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就此說明，以保留我的原創權利。

我相信這本書的出版，不僅有利於《詩經》學的發展和深入，亦將對經學與古史研究在方法論上帶入新的思考與整合。受邀學者來自陸港臺歐美各地區，在《詩經》學方面富有創見和開拓力，本書題為《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希望由此為讀者呈現從多種角度，不同方法研究經典和古學的嘗試和探索。

本書的出版首先要感謝本人所在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諸多同仁如周國正教授、葛曉音教授、劉楚華教授、吳淑鈿教授等對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浸會大學副校長陸大章教授、蔡亞從教授、文學院長鍾玲教授都撥冗參加了會議。中文系的博士生許景昭、黃梓勇、伍煥堅等承擔了翻譯、通訊、宣傳等大量工作。其他系內同仁、祕書、學生亦承擔了會議組織、接待等繁雜的事務。論文集的出版，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雲博士慨然接受，編輯顧佳女士用了大量時間審讀文稿，並提出了諸多修訂意見。沒有以上諸君的支持，本書則不可能面世。

2009 年 12 月序於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陳 致

跨學科視野下的詩經研究

目 錄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術叢書”總序	謝志偉 1
序	陳 致 1
周原撫卪	
——周公廟發掘與詩篇原始（日本早稻田大學 稻畑耕一郎）	1
從《周頌》與金文中成語的運用來看古歌詩之用韻及四言詩體的形成	（香港浸會大學 陳 致） 17
《詩經》之水與中國文學中水意象的歷史考察	（山西大學 劉毓慶） 60
《詩經》研究也應該走出疑古時代	
——以《召南·甘棠》詩的詮釋為例（臺灣玄奘大學 季旭昇）	174
《詩經》之微指	
——以心理語言學理論分析《木瓜》《東門之墀》	
（德國海德堡大學 梅道芬 Ulrike Middendorf）	212
毛詩之後：中古早期《詩經》接受史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柯馬丁 Martin Kern）	236
從熹平殘石和竹簡《緇衣》看清人四家詩研究	
（上海社科院 虞萬里）	251
劉沅《詩經恆解》的聖人論述	（臺灣中研院 蔣秋華） 309

周原撫撫

——周公廟發掘與詩篇原始

日本早稻田大學 稻畑耕一郎

一、前 言

由於漫長時光的隔閡，古代距離今天的我們極為遙遠，它的真實姿態也總是籠罩在一層神秘的面紗背後。儘管古代如此引人遐思，但我們對它的瞭解却難免停留在十分模糊的認識之中。正因為如此，人們對古代的認知與其說是從歷史事實或客觀的角度出發，倒不如說是一種當時時代精神的反映。因此漢朝時有漢朝人認知的古代形象，宋朝時有宋朝人對遠古的詮釋。這樣的現象反映出：所謂的“古代”，其實往往是復蘇於當時人們腦海裏的新形象。

在 21 世紀的今天，人們又是如何描述當代的中國古代形象呢？如今，忽略發掘出土的考古成果，僅根據對傳世文獻的解讀就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文化，恐怕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中國自古以來即對文書記錄極為重視，各式各樣的傳世文獻得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來。因此在各種出土資料中，文字記錄又有其獨特的意義。從 19 世紀末發現的甲骨文，到近年來不斷於楚地出土的戰國時代竹簡，通過對這些資料的分析解讀，今天我們對古代中國的認識無疑比過去更加確切。一個多世紀以來的研究進展，令人深切感受到：時代已從“尚古”、“信古”，經過“疑古”，進入到“釋古”、“考古”

的階段了。

中國從地下發掘出土的古代遺物比世界上任何地區都來得豐富。根據這些新出土的考古資料，進行對傳世文獻的重新解讀，是着眼於實際的重要研究手法。相較於憑藉比較神話學、文化人類學等手段來重新建構古代人精神面貌的治學方法，其重要性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我們將討論的範圍限定在與《詩經》有關的話題，那麼 1994 年出現於香港古玩市場，隨後納入上海博物館典藏的先秦竹簡——即所謂“上博楚簡”——應是最佳的例子。這部竹簡中有被命名為《孔子詩論》的相關記載，孔門學人間對《詩》進行熱烈討論的情形，得以從中窺見一斑。衆所周知，《論語》記載孔子經常對弟子闡述《詩》的微言大義，而根據該竹簡的記載，這樣的學風直到戰國中、晚期，依舊保留在孔門弟子之間。

然而與當初的期待大異其趣的是，儘管有這樣劃時代意義的資料出土，關於詩篇的背景和詩句的原意却没有太多必須大幅修正之處。當然，這部竹簡是殘存 29 支的斷簡，從中可得到的訊息自然十分有限；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不論從今天的眼光看來有多麼古老，它却是在詩篇誕生數百年後才出現的。其中就算有與《毛傳》、鄭箋等漢代學者的闡釋不同的地方，最多也只是反映了戰國時期某個特定學派對《詩》義的解讀，儘管堪稱為治《詩》之學的濫觴，但如要深入理解詩篇誕生的原義或背景，我們依舊無法否認這些解釋在時間上仍存有一定的隔閡^①。

作為與《詩經》詩篇同時代的文字資料，過去有西周青銅器的銘文。依據銘文，我們可以確認若干詩篇的創作背景，譬如彰顯文王之

^① 《毛詩小序》與《孔子詩論》的顯著差別，在前者的衆多詩篇有“刺幽王也”（《雨無正》、《小弁》、《巧言》等）、“刺宣王也”（《小宛》、《祈父》等）、“刺平王也”（《揚之水》）、“刺莊公也”（《蟋蟀》）、“刺晉僖公也”（《青蠅》）、“桓王失信”（《兔爰》）、“衛頃公之時”（《柏舟》）等，有具體的創作時期；後者則極少有能推定創作年代的記載。

德的《大禹鼎》銘文就是一例。但這些彝器多為傳世器物，出土時的狀況不甚明確者比較普遍，器物的數量也相當有限，作為探討詩篇背景的論據，其功能是受到局限的。然而，根據1976年在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法門鎮發現的史牆盤（徽氏家族窖藏銅器），以及2003年1月在寶雞市眉縣馬家鎮出土的迷盤（窖藏銅器），由文王至宣王的周王室世系得以明朗化，《史記·周本紀》記載的正確性獲得證實，可以說是很大的進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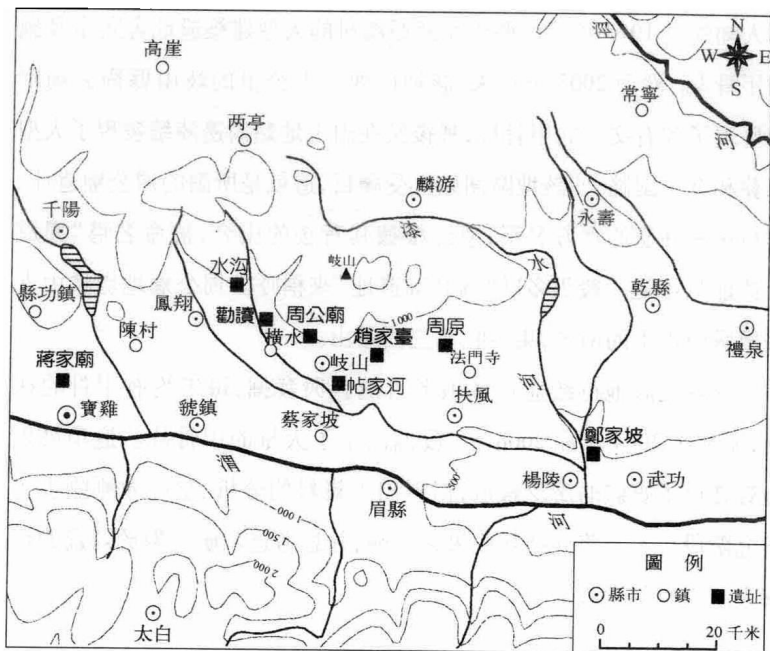
在這樣的背景下，近年來西周考古學領域又獲得了很大突破。其成果即為：在陝西省西安以西、靠近周原的西端，位於寶雞市岐山縣的周公廟所發掘的大量卜辭甲骨片。關於周原的考古發掘，過去較為為人知的是1977年岐山縣東北部鳳雛村的大型建築遺址窖穴中發掘的甲骨^①。然而2003年年末，該地以西二十公里的岐山縣周公廟附近發現了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其後又在出土地點周邊陸續發現了大型墓葬和夯土圍牆，使該地區開始大受矚目，這就是所謂的周公廟遺址。作為正式註冊的官方名稱，遺址根據其背後的山名，被命名為“鳳凰山遺址”，不過一般仍多以“周公廟遺址”來稱呼。周公廟地處岐山支脈鳳凰山正下的南麓，東、西、北三面環山。

學者在該地持續進行各項考古調查與發掘，每年均有甲骨的採集，尤其在2004年和2008年，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甲骨片。這項發現儘管獲得了媒體的廣泛報道，但對出土資料的分析、整理才剛剛步入研究階段。本文將介紹其成果之一端，並思考這項研究對於詩篇的理解上所具有的意義。

① 參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徐錫臺《周原甲骨文綜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朱歧祥《周原甲骨研究》（臺灣學生書局，1997年）、曹瑋《周原甲骨文》（世界圖書出版社，2002年）等。

二、周公廟發掘經緯

周公廟地處寶雞市岐山縣，其位置相當於所謂“周原”地區的最西端。周原的範圍由岐山南麓延伸到渭水水畔，是地勢較高而相對平坦的臺地。廣義的周原地域廣大，東起武功縣，西至鳳翔縣，東西 70 公里、南北 20 公里。其中，西周時期的遺址又特別集中在扶風縣與岐山縣接壤之處。如將範圍更加限定，則東自扶風縣西北部的劉家溝（齊家溝）起，西至岐山縣東北部的岐陽、衙里等村落附近，一般將這一東西南北延伸數公里的地區稱作“周原遺址”。[圖一]



[圖一] 周公廟遺址位置圖(鳳凰山(周公廟)考古隊《2004年夏鳳凰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6卷所載)。

據此,1999年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及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組織的“周原考古隊”承襲先前的研究成果,將發掘工作的重心置於扶風縣與岐山縣相接壤的區域。其後,在數年內發掘出大型夯土建築基址群(雲塘村)、居住遺址(齊家村)、馬坑(賀家村)、石器作坊(齊家村)等為數眾多的遺址;同時也在若干灰坑中出土了青銅器的陶範與陶模,以及卜骨13片(其中一片刻有6行37字的卜辭)^①。

儘管有上述的成果,“周原遺址”的墓地數亦多,但規模皆小,葬俗有不同,年代也不是同一个时代,沒有可視為王陵級的高級墓葬。根據隨建築遺址出土的窖藏青銅器的分布及其銘文來判斷,這些遺址多與異姓臣下相關,沒有足以斷定屬於王族的建築。因此,學者判斷此地并非《詩經·緜》中所記載的“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即太王古公亶父率領族人移居的宮室遺址;而應是當時異姓貴族聚居之地。將遺址年代推測為西周中晚期的意見較多,這也是原因之一。

2003年12月,考古人員在距該地以西直線距離約二十公里的周公廟東南部進行地上勘探過程中,從小溝的斷面壁上採集到兩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合計共刻有55字。發現者是周原考古隊的領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徐天進教授及他的學生^②。

以此卜辭甲骨的發現作為契機,為了進一步對周公廟的周邊地

① 周原考古隊《2002年周原遺址(齊家村)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3年第4期)、曹瑋《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同前)。

② 徐天進《周原遺址最近的發掘收穫及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第4號,2004年,日本中國考古學會);徐天進《周公廟遺址考古調查的緣起及其學術意義》(《中國文物報》2004年7月2日);種建榮、雷興山《周公廟遺址甲骨坑H1發掘記》(《文博》2005年第1期);周原考古隊《2003年陝西岐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五卷,2006年12月)等。

區展開發掘調查,2004年2月,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共同組成了“周公廟考古隊”。一直到2008年年末的數年之間,憑藉相關人士的共同努力,考古隊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由於發掘工作仍在初期階段,我們還無法說明整個遺址的全部面貌,但我認為,到目前為止的出土成果中,有足資思考《詩經》詩篇發軔背景的新資料。

三、周公廟發掘成果

目前為止,發掘墓地有7處,其中最受矚目的是周公廟背後的鳳凰山南側傾斜山腹中的大型墓葬——陵坡墓地。此地目前確認的墓葬共有37座,其中擁有4條墓道的有10座,3條、2條、1條墓道的各4座,另有豎穴土坑墓、車馬坑等。在過去發現的西周墓葬中,沒有出現過有3條、4條墓道的大型墓,從墓葬的規格和帶墓道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想這必定是等級相當高的墓地。其中擁有4條墓道的第18號墓,以及位於該墓葬南邊有2條墓道的第32號墓已經過發掘調查,然而都曾遭到過多次盜掘,墓室裏已無陪葬品殘留。從留存在盜洞裏的少量車馬器及陶片來判斷,可以推定前者屬西周晚期,後者屬於西周中期^①。[圖二]

① 關於周公廟的發掘成果,參考《周公廟西周墓葬群重大發現專家談》(《文博》2004年第5期);種建榮、雷興山《周公廟遺址西周大墓與夯土圍牆發現記》(《文博》2005年第3期);《古代文明》(第5卷,2006年12月)所載的報告及論文;鳳凰山(周公廟)考古隊《2004年夏鳳凰山(周公廟)遺址調查報告》(《古代文明》第6卷,2007年12月)。另參見徐天進《周公廟遺跡の近年における成果とその考察》(宇都木章《出土文物からみた中國古代》2008年11月,日本汲古書院)等,以及筆者自2004年以來於當地的見聞調查。還有2009年3月14日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召開的“周公廟考古發掘工作匯報暨新出西周甲骨座談會”上雷興山《周公廟遺址2008年度出土卜甲的考古背景》、董珊《2008年周公廟遺址出土甲骨文字》等報告。